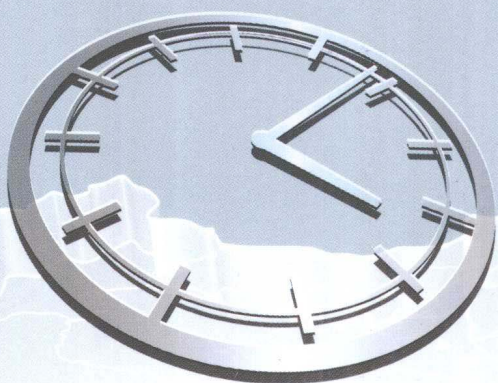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 地区差异研究

朱捷◎著

WOGUO WAISHANG ZHIJIE TOUZI
DIQU CHAYI YANJIU



中国物资出版社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 地区差异研究

朱 捷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研究/朱捷著.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47-3764-9

I. ①我… II. ①朱… III. ①外国投资: 直接投资—影响—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832.6②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4813 号

策划编辑 寇俊玲
责任编辑 涂 晟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梁 凡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clph.cn>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 (010) 68589540 邮政编码: 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43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47-3764-9/F·1475

定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加快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步伐，FDI 俨然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趋势。当前我国 FDI 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态，成为亚洲以及整个发展中国家中吸引 FDI 最多的国家，然而 FDI 地区分布呈现非均衡性，严重失衡，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较大。本书以 FDI 理论、区位理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等为指导，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 FDI 研究方法、成果和经验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 FDI 的数量、能力、效率三个层次出发，引用 1982 年至 2007 年各省市数据，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及省际 FDI 区域差异分别进行逻辑实证研究，在分析 FDI 区域分布时空差异特点基础上，进一步探求造成吸引 FDI 综合能力和利用 FDI 效率的区域差异的原因，为积极引导 FDI 投向中部、西部地区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供实证依据。



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城市化进程迅速提升,科技水平明显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强,外贸发展速度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的腾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国际地位逐步提升。然而,不可避免的还是我国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从2000—2007年东部地带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62%,而西部地带仅占到17%,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就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带一枝独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西部,西部发展较缓慢,并且东部、西部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增大。

为了有效缩小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做了广泛的分析,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性分布的基础上展开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是集资本、知识、管理于一体的“一揽子”创造性投资,已成为最重要的知识和技术转移载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转让,因而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经济正在快速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以吸引FDI,各级地方政府也争相吸引FDI进入本地。到21世纪初期,FDI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从实际国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充分发挥中国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和利用FDI,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FDI利用大国,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本引进国。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引进FDI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中国综合国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吸引的FDI在国内各地区间的地理分布呈现非均衡性,严重失衡——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比重上。目前我国吸收的FDI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带,而占全国的83.4%面积、人口占全国近60%的中部、西部



地带吸引的 FDI 仍然很少。东部地带 FDI 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对 FDI 利用水平的差异也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由此,需要研究我国 FDI 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程度及其影响、造成区域利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及缩小这一差异的对策、影响外商投资地区选择因素等问题,以对区域经济政策有所裨益。

本书首次将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分解方法引入 FDI 的区域水平差异中,探讨区域差异具有三大地带 FDI “群体趋同”现象、地带间比地带内差异更突出的变动趋势,分析得出,地带间省际的不均衡发展、政府对内陆迟迟没有出台与之相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等原因造成这种差异。在测算省际 FDI 数量差异时,引入区域重心的概念,考察区域差异的动态演化过程。本书从吸引能力角度探讨了我国区域间 FDI 的能力差异,采用跨地区的时间序列模型 (Panel Data Model),从需求方角度出发,选取优惠政策、市场规模、财政收入、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政府运转效率六个代表性指标,实证分析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带这四个层面影响 FDI 流入的各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省际吸引 FDI 能力的评价体系。通过聚类分析法,将全国 29 个省市分成三类,探寻我国区域间吸引 FDI 能力的比较优势及存在问题。本书将效率概念导入外资理论,从效率这一全新角度尝试较深入地研究 FDI 区域差异问题;增加了结构效率这一层次,从结构、微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对我国区域间利用 FDI 效率差异分别进行逻辑实证研究,从而能够全方位地对我国利用外资效率加以考察。

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 FDI 问题的研究已经从原来表浅和零碎的阶段走了出来,进入一个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研究阶段。我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我国 FDI 研究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朱捷

2010 年 10 月



目 录

1 导 论	(1)
1.1 选题背景	(1)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3)
1.2.1 研究目的	(3)
1.2.2 研究意义	(3)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4)
1.3.1 国外研究动态	(4)
1.3.2 国内研究动态	(9)
1.3.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13)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14)
1.4.1 研究思路	(14)
1.4.2 研究方法	(15)
1.5 本书创新之处	(17)
2 FDI 地区差异研究的理论基础	(19)
2.1 相关术语的界定及分类	(19)
2.1.1 FDI 内涵界定及分类	(19)
2.1.2 三大地带的划分	(22)
2.1.3 相关概念区分	(23)
2.2 理论依据	(24)
2.2.1 FDI 理论	(24)
2.2.2 区位理论	(36)
2.2.3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40)
2.3 FDI 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42)



3 国外 FDI 的经验及借鉴意义	(50)
3.1 发达国家 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50)
3.1.1 美国 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51)
3.1.2 日本 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55)
3.2 发展中国家 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58)
3.2.1 墨西哥 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58)
3.2.2 印度 FDI 区域差异及经验	(62)
3.3 国外 FDI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65)
4 我国 FDI 数量的区域差异	(70)
4.1 FDI 数量差异的测算方法	(70)
4.1.1 相对差异指标的选取标准	(70)
4.1.2 相对差异指标的计算方法	(71)
4.1.3 样本空间的确定和数据的选取	(75)
4.2 我国总体 FDI 数量差异	(76)
4.2.1 我国 FDI 的国际比较	(76)
4.2.2 我国 FDI 的发展历程	(78)
4.3 三大地带 FDI 数量差异	(84)
4.3.1 三大地带 FDI 总体情况	(84)
4.3.2 三大地带 FDI 区域分布的时空变异	(88)
4.4 省际 FDI 数量差异	(99)
4.4.1 省际 FDI 总体情况	(99)
4.4.2 省际 FDI 区域分布的时空变异	(102)
5 我国吸引 FDI 能力的区域差异	(109)
5.1 吸引 FDI 能力内涵	(109)
5.2 吸引 FDI 能力分析	(110)
5.2.1 时间序列模型	(110)
5.2.2 无量纲化	(110)
5.2.3 因子分析法	(111)
5.2.4 聚类分析法	(112)



5.3 FDI 影响因素分析	(112)
5.3.1 FDI 影响因素的设置	(112)
5.3.2 模型选择	(118)
5.3.3 实证分析	(121)
5.4 吸引 FDI 能力差异评价	(127)
5.4.1 公因子的提取	(127)
5.4.2 中国各地区吸引 FDI 综合能力得分和排序	(130)
6 我国利用 FDI 效率的区域差异	(138)
6.1 不同经济学流派对效率的定义	(138)
6.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效益的论述	(138)
6.1.2 西方经济学对效率的解释	(139)
6.2 利用 FDI 效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衡量标准	(140)
6.2.1 利用 FDI 结构效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衡量标准	(140)
6.2.2 利用 FDI 微观效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衡量标准	(142)
6.2.3 利用 FDI 宏观效率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衡量标准	(144)
6.3 我国利用 FDI 效率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146)
6.3.1 我国利用 FDI 结构效率区域差异	(146)
6.3.2 我国利用 FDI 微观效率区域差异	(154)
6.3.3 我国利用 FDI 宏观效率区域差异	(161)
7 结论与建议	(167)
7.1 主要结论	(167)
7.2 对策与建议	(168)
参考文献	(177)
后 记	(193)



1 导 论

1.1 选题背景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 1978—2007 年的 30 年时间,GDP 由 3645.2 亿元增加到 249529.9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5.91%;人均 GDP 由 381 元增加到 18934 元。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带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却长期存在。20 世纪 80 年代中部、西部地带比东部地带平均增长率低约 1 个百分点,20 世纪 90 年代则低 2~3 个百分点(王小鲁,2004)。近几年来,差距又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拉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倾向,以至于胡鞍钢(2002)指出我国的地区发展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2008 年,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亚洲的分配不均》研究报告中指出:2007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48,而美国为 0.46。虽然低于分配过于悬殊的墨西哥(0.55)和巴西(0.54),但是我国已经进入了不平等程度偏大的区间。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长期存在,势必影响到我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范剑勇,2004)。基于上述考虑,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消除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如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地区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带的崛起。”

出台相关政策的关键是必须理清楚在国家整体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地区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断扩大的原因,这也是有效缩小我国地带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前提。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如 Aguinier(1988)分析了中国地区发展的战略模式及其演变,认为改革开放后实施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拉大了东部、西部地带的差距;贺灿飞(2004)认为改革开放政策、参与全球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以及城市化进程等是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时空变化的显著原因;石垒(2006)研究发现不同地区二



元经济转型的差距是形成中国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上述研究无疑对我们加深理解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及形成原因具有重要意义,而本书将在 FDI 地区非均衡性分布的基础上展开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加快了吸引 FDI 的步伐,FDI 俨然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趋势。近 30 年来,随着经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日益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理想地点之一。在 2001 年及 2002 年全球 FDI 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吸引 FDI 仍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2003 年我国吸引 FDI 总量为 535.05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04 年我国吸引 FDI 总量为 606 亿美元,约占世界 FDI 总量的 9.8%。据 2008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在全球 FDI 持续增长的年份里,中国仍然保持了发展中国家利用 FDI 最大量的位置;2007 年我国 FDI 发展势头依然劲猛,居于全球第六位,成为亚洲以及整个发展中国家中吸引 FDI 最多的国家。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 FDI 地区分布呈现非均衡性,严重失衡,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较大。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如 Lee (1994) 以及 Dayal-Gu-lati 和 Husain (2000) 认为不同地区 FDI 导致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江小涓(2002)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部、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慢于东部地带,中部、西部 FDI 低于东部 FDI 是导致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魏后凯(200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二元结构形成与 FDI 分布不平衡密切相关,通过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 FDI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东部与西部之间 GDP 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 90% 是由 FDI 差异引起;邱斌(2007)研究也发现:FDI 的进入对东道国产生了一定影响,FDI 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状况是我国地带间存在较大经济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既然现阶段我国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FDI 的区域分布造成的,而且 FDI 分布差异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差异。那么,由此研究我国 FDI 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程度及其影响、造成区域利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及缩小这一差异的对策、影响外商投资地区选择因素等问题,以便对区域经济政策有所裨益。这正是本书将要研究和探讨的中心问题,本书以下部分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书拟通过对比分析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以及省际之间 FDI 差异的发展趋势,探讨我国 FDI 区域差异的深层原因,为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实现国家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具体而言,本书将完成下述主要研究工作。

(1) 通过实证研究,把握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省际之间 FDI 差异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描述我国区域间 FDI 差异变动的总体态势。

(2) 探寻我国三大地带以及省际之间吸引 FDI 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而构建我国吸引 FDI 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行省份综合能力排序,找出省际吸引 FDI 综合效果的差距。

(3) 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省份利用 FDI 效率的变动情况,探寻资本效率变动的特性,发现不同地区 FDI 的比较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4) 通过本书的研究,探讨缩小地区 FDI 差距、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2.2 研究意义

FDI 作为全球经济生活中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学的重点问题之一。我国作为吸引 FDI 的大国,为 FDI 区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凯夫斯指出,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带间的 FDI 分布研究在国际上仍属于薄弱环节。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深入研究我国引进 FDI 的历程,分析我国 FDI 区位差异的变迁,揭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提高我国 FDI 的吸引和利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理论意义。①理论界虽然存在着大量对 FDI 的研究,但比较多见的是对 FDI 地区差异中的现状、问题、形成原因及对策等方面作出的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和系统分析。本书将致力于这个方面。②本书还将从利用 FDI 角度探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状况及成因,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我国地区差异以及 FDI 的非均衡流向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影响,这也将是对有关研究的重要补充。③决定一个地区区位优势的因素包括很多,诸如地理优势、要素资源优势以及政策优势



等。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并且区位优势是相对变化、动态转移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现阶段,系统地深入研究中国不同投资区位的区域优势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 现实意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尤其是在经济起飞或经济转型时期,更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严重,东部、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地区经济的非协调发展,已成为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书通过对 FDI 地区差异研究,可以解释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部分原因。因此本书根据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探寻 FDI 地区差异的原因,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国 FDI 的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为实现积极有效合理的 FDI 利用提供帮助,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1.3.1 国外研究动态

(1) FDI 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作用研究。关于 FDI 对东道国区域经济的影响及作用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外学者和跨国公司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从整个学术界来看,关于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三种: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说、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无作用说和 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说。

A. 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积极作用说。外资作为一个资本存量,它的流入可以增加用于投资的总体财政资源,缓解潜在的发展瓶颈,如储蓄和外汇短缺。通过缓解这些瓶颈和限制,外商的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当地的资本的形成和经济增长。Goldsmith (1969) 首次通过定性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市场的缺位或者不完善,会限制本国企业对外资企业先进知识、技术等方面的吸收。Naughton (1996)、Bransteter、Feenstra 和 Chen (1999) 等定性研究之后,认为 FDI 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

Tu 和 Schive (1990) 以中国台湾为例,考察了 FDI 对经济增长、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私人消费以及进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FDI 通过刺激私人固定资产



投资和增加出口,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但对私人消费和进口没有显著的影响。Kueh (1992) 讨论 FDI 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发现 FDI 对总资本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沿海地区重要的工业生产商和出口商。Balasubramanyam (1996) 利用过去 20 年中 FDI 由发达工业国流向 69 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数据,研究结果表明,FDI 只对进口替代型的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出口导向型的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甚微;同时还发现,经济增长能够更好地吸引 FDI。Borensztein (1998) 等通过对 69 个发展中国家 1970—1989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 FDI 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导致经济增长。Demurger (2001) 研究发现,FDI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为 FDI 的进入为当地企业带来竞争,迫使当地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B. 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无作用说。Bhagwati (1978) 发现 FDI 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会因为出口鼓励的贸易政策而提高,但也会因为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而降低,因此认为 FDI 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不一定有促进作用。Kholdy (1995) 运用 Granger 因果检验,对东亚 10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未发现 FDI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Pami Dua 和 Aneesa I. Rashid (1998) 在向量自回归模式的架构里运用了 Granger 因果检验,分析印度后自由化时期 FDI 对其工业生产水平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流入的 FDI 与印度的工业生产没有因果关系。Carkovic 和 Levine (2002) 对 72 个国家 1960—1995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只在 5 年期内 FDI 对经济增长有不规则的显著性影响,而从长期来看,FDI 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普适性、独立性的正面影响。Chakraborty 和 Basu (2002) 认为,印度的 FDI 与 GDP 正相关,并且印度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经济自由政策”对印度引进外资贡献很大,但是短期内 FDI 与 GDP 并无因果关系,FDI 对 GDP 的贡献度并不明显。Nathalia Fabric 与 Sylvain Zeghni (2002) 通过对俄罗斯的研究结果,认为 FDI 与 GDP 两者不相关。Eswar S. Prasad、Raghuram G. Rajan 和 Arvind Subramanian (2007) 运用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资流入并未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便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吸收能力也很有限,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完善或者是国内经济对外资过度依赖。

C. FDI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较大的“左”倾发展经济学派,如 Arthur Lewis、Prebisch 等对 FDI 持怀疑态度,主张发展中国家为了培育当地“民族工业”,应对 FDI 予以限制。Salz I. S. (1992) 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论证了发展中国家 FDI 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East-



erly (1993) 认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 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 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J. Cornwall 和 W. Cornwall (1994) 认为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包括 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新经济增长模型夸大了, 比较而言, 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更可靠。Tsou、Liu (1997) 和 Chen (1999) 利用中国台湾制造业厂商的资料分析认为 FDI 在中国台湾的外溢效果十分有限, 甚至为负。Amitava Krishna Dutt (2000) 通过对 FDI 至东道国各部门流入量与经济发展的分析得出结论: 无论 FDI 在部门间如何分配, 与经济增长都呈负相关关系。L. P. King 与 B. Varadi (2002) 认为短期内 FDI 对匈牙利经济起促进作用, 然而长期来看, 外国公司目前的成功会导致社会有害的市场集中, 甚至阻碍未来经济的增长。

(2) FDI 区位动因分析。

A. 理论方面。对 FDI 动因的理论分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的研究大多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出发, 研究其为什么进行对外投资, 而现在的研究多数从区位选择的角度展开, 以解释为什么跨国公司投资在这个地区和国家而不是其他的地区和国家。

1960 年, 美国学者海默 (Stephen H. Hymer) 在其博士论文《民族企业的国际经营: 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通过实证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 创立了垄断优势理论, 在理论上开创了以 FDI 为研究对象的崭新理论, 标志着 FDI 理论的产生。

Vernon (1966) 对 FDI 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比较优势一面, 如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交通和通信成本、相对技术水平等。Kojima (1978) 将 FDI 分为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 投资东道国在自然资源、市场、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决定了投资母国的区位选择和投资类型。邓宁 (Dunning, 1980, 1993) 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 影响 FDI 的区位选择优势包括: 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市场的空间分布以及投入品的价格、质量和生产率等。

Leonard (1985) 发现 FDI 不愿流向环境保护标准高、污染管制严的国家。Clegg (1992)、Hines (1996)、Benitoand 和 Gripsrud (2002) 认为关税壁垒、税收优惠以及语言文化差异也会影响 FDI 流向。Tatoglu 和 Gaister (2003) 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材料和劳动力供应、政治和法律环境、产业竞争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等是 FDI 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些学者从聚集效应的角度对 FDI 区位选择进行了分析。波特 (Porter, 1990) 认为一个地区吸引 FDI, 是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 可以得到特



定的服务设施和熟练劳动力,具有良好的区域形象和大量的产业集中。Kmgman (1991)、Dermot 和 Davelin (2001) 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 和 Chang (1996) 等用国别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倾向于采用“跟进策略”,同时也重视早期的直接投资。

B. 实证方面。国外的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FDI 的各种影响因子,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Agodo (1978) 发现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和 FDI 的流量正相关,并认为不是规划本身,而是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环境对外资有吸引力。Carlton (1983)、Bartik (1985)、Head (1995) 的研究发现,企业在选址时往往会考虑产业活动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以获得正的外部效应。Coughlin 等 (2000) 研究得出, GDP、劳动生产率与 FDI 流量正相关,而平均工资、文盲半文盲率与之负相关。Farhad Noorbakhku、Alberto Paloni I. (2001) 利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 36 个国家 1980—1994 年 15 年的数据,通过定量分析得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的技术水平对一个国家吸引多少 FDI 有着很重要的影响。Alan A. Bevana、Saul Estrin (2004) 利用瑞士、波兰、日本、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 1994—2000 年的数据,通过双边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 FDI 和东道国与母国的 GDP 水平有很强的正联系,而与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单位劳动力成本关系却是很弱。Yong Suhk Pak、Young-Ryeol Park (2005) 基于日本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地理选择以及流向,分析了 FDI 在选择国家流向方面的决定因素。

国外学者对于我国 FDI 的区位选择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 Wheeler 和 Mody (1992) 在研究中将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FDI 存量统称为集聚经济效应,认为集聚经济效应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有正的显著影响。Gong (1995) 认为能源消费、投资刺激 FDI 流量正相关,而城市非农业人口与之负相关。Chen (1996) 通过对 1987—1991 年外资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外资偏爱西部的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与外资的分布无关,交通基础设施对外资的分布影响较大。Chen (1997) 通过对我国 1987—1991 年 30 个省区外资企业研究发现市场增长潜力、交通设施与 FDI 流量正相关,资源配置效率与之负相关。Wei (1999) 发现税率和腐败与外资流入量呈显著负相关。Cheng 等 (2000) 研究表明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与 FDI 投资量正相关。Leonard K. Cheng 和 Yunk Kwan (2000) 发现 FDI 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并且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特区政策对吸引 FDI 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工资的影响不显著。Frank S. T. Hsiaoa 和 Mei-Chu W. Hsiaob (2004) 认为语言与文化上的相似性、



地理上的就近性以及历史文化的联系对中国 FDI 的进入有着很强的决定作用。上述这些文章对中国利用外资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的现实不是很了解,掌握数据有限,因而分析不够深入,结论与事实有一定的差异。

(3) FDI 影响经济效率研究。FDI 不仅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而且还影响着流入国经济效率的各个方面的变化。定性分析 FDI 对效率的影响,或者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大部分学者使用宏观汇总资料或案例,定量研究 FDI 对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及资源配置等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流入的 FDI 被视为东道国经济效率获取的重要途径 (De Mello, 1999; Fleisher 和 Chen, 1997; Walz, 1997; Markusen 和 Venables, 1999)。流入一国的 FDI 往往是一方面能够带来额外的资本和新的生产、管理技能以提高东道国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FDI 的流入同时能够带来间接知识的外溢效应 (Blomstrom 和 Kokko, 1996),很多时候 FDI 所带来的间接的技术外溢效应要比它所带来的直接效应要大得多 (Blomstrom, 1986; Mansfield 和 Romeo, 1980)。尽管大多数的生产率研究偏重于外溢效应,但 FDI 对东道国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同时进行。FDI 流入除增加资本存量,提高投资质量,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稀缺以外,还带来了技术。除此以外,FDI 的进入对于东道国来说,隐形的影响便是技术的转移和外溢效应。FDI 可以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要素生产率,使国民经济走上内生增长道路 (David Parker, Kirit Vaidya, Xiaming Liu, Yingqi Wei, 2000)。OECD (2002) 发展报告中指出:FDI 将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来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家来说,FDI 还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而 Rodrik D 直接对 FDI 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有多大提出了质疑。FDI 的引入,可使东道国通过劳动培训技能掌握来改变东道国现有的知识存量,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将毫无疑问促进当地的生产效率 (De mello 和 Sinclair, 1997)。

FDI 的流入促进全社会固定资产的形成,同时随着 FDI 大量的流入发展中国家,资本—劳动的比率不断攀升,人均资本密度越高的企业对应着更高的生产率,即资本密度与劳动生产率成正向关系 (Blomstrom, 1983)。跨国公司本身拥有许多的优势,而这就直接导致外资企业本身一般具有比国内企业更高的生产率水平 (De Gregorio, 1992),这样在 FDI 流向生产水平相对偏低的发展中国家时,对它们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有一个简单的数学的加权平均作用。